

贵阳王阳明研究会 会 刊

第一期（总 9 期）

2002 年 2 月 7 日

目 录

- 一、21 世纪呼唤儒商——中国传统文化与
现代儒商研讨会综述 李友学
- 二、“知行合一”与道德建设 陈昌志
- 三、“致良知”与东瀛现代儒商 元 华
- 四、王阳明画象曾作过流通纸币主图案象 李元明
- 五、贵阳王阳明研究会二届三次理事会纪要
- 六、贵阳王阳明研究会 2001 年工作总结
- 七、贵阳王阳明研究会 2002 年工作要点
- 八、贵阳王阳明研究会举行迎春联谊会
- 九、《中国儒学年鉴》2001 年创刊号资料选载
 - 1、贵阳王阳明研究会
 - 2、王阳明心学研究
 - 3、论著索引

贵阳王阳明研究会 会 刊

第一期（总 9 期）

2002 年 2 月 7 日

目 录

- 一、21 世纪呼唤儒商——中国传统文化与
现代儒商研讨会综述 李友学
- 二、“知行合一”与道德建设 陈昌志
- 三、“致良知”与东瀛现代儒商 元 华
- 四、王阳明画象曾作过流通纸币主图案象 李元明
- 五、贵阳王阳明研究会二届三次理事会纪要
- 六、贵阳王阳明研究会 2001 年工作总结
- 七、贵阳王阳明研究会 2002 年工作要点
- 八、贵阳王阳明研究会举行迎春联谊会
- 九、《中国儒学年鉴》2001 年创刊号资料选载
 - 1、贵阳王阳明研究会
 - 2、王阳明心学研究
 - 3、论著索引

21世纪呼唤儒商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儒商研讨会综述

贵阳王阳明研究会 李友学

贵州省中华文化研究会和贵阳王阳明研究会联合举办由贵阳王阳明研究会具体筹办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儒商研讨会”于2001年11月26至27日在贵阳召开,来自香港特区、上海、广东、陕西、台湾等地区和贵州贵阳的专家和儒商共80余人到会,收到论文70篇。研讨会采取大会发言与小组讨论相结合,先后有50余位专家和儒商在会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研讨会的两次大会先后由贵州省中华文化研究会执行副会长、贵州日报社社长高宗文和贵阳王阳明研究会会长、贵阳师专校长王晓昕教授主持。研讨会实行专家和儒商研究相结合、文化与经济研究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研究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始终围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建设有机结合,促进企业文化的发展和经营者素质的提高,推进两个文明建设这个宗旨,进行了两天热烈隆重、生动活泼、友好争鸣的研讨,取得了圆满成功。国际儒商学会会长潘亚暾教授亲临大会作了“热烈欢呼儒商世纪的光临”的主题发言,香港儒商学会会长、孔教学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因故不能赴会,也请人在会上宣读了贺词和“儒家文化与中国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发言专稿。专家和儒商的广泛发言和内容丰富的论文,使这次研讨会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性、理论性,也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决策的参考性。现将这次会议研讨的要点综述如下:

一、中国儒学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影响

在讨论中许多专家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儒学的现代价值。贵州省社科院的李双壁副研究员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精神文化财富。它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小农社会，长期以来一直是维护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稳定的最有效的精神粘合剂。时至今日，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这一思想还有没有正面的价值？儒家所主张的封建宗法制度、君权至上观念，三纲五常论理以及重道轻器的思想，的确与市场经济及现代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理应摒弃。但是，儒家思想体系本身是个多维向的内涵丰富的大系统，是个良莠并存、玉石俱生的宝库，其社会论理、经济论理经过现代性阐释和挖掘，仍能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的事业中发挥作用。接着李双壁从四个方面阐释了儒家思想对市场经济的正面影响，一是孔子的义利观和致富有道思想，对今天的市场经济仍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二是儒家的诚信道德观，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诚信是一种最重要的商业道德，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三是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条积极的互利主义原则，充分肯定了行为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合理性。因而有可能激励人们去大胆创造，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可以调节人我之间的利益分配，使之趋于合理和公平。儒家倡导的人我兼顾的互利主义，因其具有独特的激励和调节功能，以及启发人们关心和看重他人正当利益的价值导向作用，理应成为当今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本道德原则；四是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为我们今天处理人与环境关系大课题提供间接的文化性资源，进而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使人从自然的征服者自觉地转变成合作者，从而正确地处理经济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对儒家文化与中国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关系，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说：“在中国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如何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化，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并在这基础上复兴中华文明，乃至于行“仁”於天下，建立大同世界，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时代在呼唤新的儒商。对儒家经济思想在市场经济中的影响，汤恩佳博士作了十分肯定的论述，他明确指出“孔子儒家在经济思想方面的理论十分丰富。对今天中国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和而不同”、“和为贵”的精神可以帮助经济的发展缔造一个安定、和平的社会环境；“生财有道”、“见利思义”，先义后利的义利观可以引导市场经济走向正确健康的发展道路，“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可以引导市场经济建立高尚的精神文明；儒家敬业乐群、勤劳俭朴、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政以德”以人为本的观念，可以帮助市场经济建立科学的管理模式；“庶、富、教”以及薄税轻徭的惠民理念，可能帮助市场经济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因为儒学适应了人类基本的道德要求，因此，儒家在新世纪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仍可成为人类共享的文明财富和人类道德的基础。上海综合开发研究院的汪义生研究员指出：“今日社会，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道德堕落，极端自私，拜金主义，非人性化倾向。要解决、克服这些精神领域的恶疾，必须依靠精神力量，靠道德教育。儒学作为一种蕴藏着丰富精神资源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能够启发、唤醒人的道德良知，提升内在心性，催发人们努力步入理想的人格境界。“新华商”清醒地意识到：现代社会可以从儒学中发掘出许多丰富有益的资源，儒家的理想人格在自由民主环境中要比在封建社会里得到更充分的

体现。从华商的实践中可以看到，儒学从理性、自由、平等、人权、法制、科学、民主等现代化启蒙精神中汲取养分，其产生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二、阳明学与近代工商业发展和道德重建的关系

阳明学是中国儒学的继承和发展，是集心学之大成者。但王阳明对儒商及其相关的问题有许多精辟独特的见解，成为儒学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亮点，使那种认为儒家思想阻碍着中国工商业发展的观点不能不有所修正。贵州师大教授余怀彦指出：王阳明在致良知的前提下，提出“钱谷兵甲，搬柴运水，无害于天理，”“声色货利之交，无非天则流行矣，凡有社群的地方，人们都需要买卖东西，人们这种私欲是完全正当的，商人使人们这种私欲得到满足，从中赚到合理的利润，也是完全正当的，都是天理。这样，正当的欲求都变成了天理，灭人欲只是灭掉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那部分私欲。王阳明的后继者正是抓住这点，很快把“公”与“私”、天理和人欲统一起来。王阳明反对歧视工商，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王阳明说：“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於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他主张士农工商都是社会需要，并无高下之分。王阳明认为，商人终日作买卖，只要能从自己的良知出发，以诚信为本，讲求信用，童叟无欺，见利思义，义利合一，买卖公平，亦无害其为圣人。王阳明对工商业者的这种看法，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为启蒙思潮架起了从传统的重农轻商到以工商为本的桥梁。王阳明本人不仅是学问家，而且是一个杰出的实践家。在他管辖的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颁布政令，开放市场，撤消重复收税，严禁军队骚扰客商，扰民者将受到严处。在王阳明的干预下，打破朝廷沿习，实现了盐业自由贸易，并明示：

“今后商税，遵照奏行事例抽收，不许多取毫厘，若资本微细，柴炭鸡鸭之类，一概免抽”。做到“不加赋而财足，不扰民而事办。”在王阳明管理江南广大地区的十多年中，采取了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经济有所繁荣，社会走向平和，为明王朝缔造了几十年安定的局面。对阳明学对工商业发展的关系，余怀彦教授深入分析说：“只有历史才能对一种学说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中国、韩国、日本在500年前王阳明所处的时代，其工商业的发展水平是基本上相同的，但由于中国和韩国都把阳明学排斥在官方的儒学之外，对工商业的发展采取限制打击的方针，结果使中国和韩国都未能迅速摆脱落后，只有日本于16世纪初接受阳明学，17世纪在中江藤树的大力倡导下，使阳明学在日本蓬勃升起，逐渐成为日本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阳明学高张人的主体性精神，帮助日本摆脱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种种精神上的封建藩籬；阳明学的简明直截，帮助日本人在历史转折关头突显了快刀利刃的性格；阳明学提倡知行合一，侧重于即知即行，合于日本人勇往直前的习惯；阳明学提倡以我为主，“宇宙在我心中”还被日本人运用来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日本人一开始就提出了要全方位的接纳西方文化为我所用，使日本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在落后于西方的条件下，很快弥补了和西方的差距，迅速走上了和西方并驾齐驱的工业发展轨道，避免了中国、韩国那样落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处境。历史是一位很好的老师，我们今天重温过去500年的历史，对于我们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更好地掌握发展的难得的机遇，探寻更合理的发展道路，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贵州民族出版社的元华女士，利用在日本的实地考察，写出了“‘致良知’与东瀛现代儒商”一文，论述了王阳明的“致良知”理论对日本思想界、企业界的巨大影响，元华提出，日本朋友十分熟

悉、了解、崇敬中国的王阳明先生，并把王学的“致良知”学说运用到发展企业及修身养性，完善人格，及培养企业人才上，培养与造就了东瀛企业界的一代新人，并因此使企业突飞猛进。贵阳市社科联主席郭长智在“王阳明的‘致良知’及其积极意义”一文中指出：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凝聚着中国古代哲人的理想和价值取向，具有生命力的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它虽然带有明显的历史、阶级局限性，但其中合理成份是主要的。“致良知”学说的精神，如仁爱重德、自强不息、忧国忧民，天下已任、见利思义、以理导欲等思想，以及仁智勇统一、真善美统一的人格境界，充分表达了人性中共同的、美好的东西，可以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如果每个公民都能做到“致良知”，那么，整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提高已不是遥不可及。“致良知”的思想虽然产生于明代，但它所包含的超越时代的积极意义和永恒价值，值得认真借鉴与吸收。

三、新儒商的出现与新儒商精神

对于新儒商出现的背景，贵州师大教授刘宗碧作了较明确的论述，她说：儒商这个近十年来走红的经济文化现象，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在建设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人们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验，参照东亚“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模式，重新审视传统的儒家文化，力图在自己国情的基础上，开发古代儒家经济价值伦理资料，把经济增长与道德建设结合起来，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之路。党的十五大指出：社会主义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与当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发生联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和经济建设实践不可缺少的思想资源。儒商热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现的貌

似旧瓶装新酒的文化经济现象。儒商既然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经济文化现象，必然反映现代的时代特征。但它与古代儒家的价值观又有直接联系，否则就只能是现代商人而不是儒商。对什么是新儒商，贵阳王阳明研究会副会长李友学在“略论新儒商的十大经营理念”的一文中：说“现在被称为新儒商的企业家，不仅显示了这个企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具有良好的人文经营理念，而且在事业和经营上卓有成效，并在取得良好成效后还能回报社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新儒商不是一般的商人和企业管理者，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新儒商不是没有或少有文化、只看重蝇头小利的盲商，也不是唯利是图靠造假欺诈致富的奸商，也不是饱食终日、小富即安的俗商，也不是稍有业绩就舞文弄墨、自我陶醉的庸商，也不是以权谋私、利用关系、靠“走后门”致富的官商，更不是致富后就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腐商，而是有较高文化、有企业奋进理想、有良好的诚信道德准则、具有传统人文精神，以德经商，以智创业，并在经营事业上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商人、企业家、实业家。新儒商将成为 21 世纪具有中国特色文化理念并取得事业成功的企业家的誉称和代名词。国际儒商学会会长潘亚瞰教授在会上介绍了他对儒商定义的界定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良好的道德品格，见利思义、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商人以及一切促进经文一体的研究者。”

对儒商精神，“中华侨网”总经理孔令文在“儒商精神——全球华商的一面旗帜”一文中论述到：儒商精神是指一种援儒入商所形成的独特的商业人格和行为规范。因而，儒商精神包括恪守信用、诚实为本、诚实不欺、利以义制、以义取财、使义疏财等商业道德，是把诚、信、义、恕、让等伦理道德原则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去，是尽量用儒家精神洗涤一味求利的商人习气。社会步入商品经济

时代,儒家精神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商业生态文明和义与利、合作与竞争、自强与自律和谐统一的商业伦理精神,这些儒商所共有的进步商德,是儒商在儒家思想熏陶下对所从事的生产经营、交换本质的独特认识,是受儒家思想浸蚀的商人的商业经营中所形成的独特的人文精神。贵阳王阳明研究会副会长李友学根据古今中外儒商经营成功的范例,结合有关专家的论述,把新儒商成功的经营理念归纳成以下十条:即(一)爱国爱乡仁爱良知的责任观;(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价值观;(三)诚信互利、等价交换的营销观;(四)顾客至上、敬谨谦和的服务观;(五)以人为本、协调人际的管理观;(六)善抓机遇、慎思笃行的经营观;(七)突破现状、推陈出新的发展观;(八)求贤若渴、知人善用的人才观;(九)物尽其用、天人合一的环保观;(十)勤俭朴素、慎独廉洁的生活观。这十条对新儒商来说,只会因人因时空的不同有所侧重,而不可缺废。这十条经营理念是一个相连互融互促的整体,其中心思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者爱人”的思想和在市场竞争中求发展的精神相结合,实现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内圣外王”,形成新儒商的新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管理中发扬光大的体现。这些新精神影响着新儒商的人生,推动着新儒商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儒商与企业文化的意义

儒商的人文性,主要体现在企业文化建设上,贵州省社科院的吴承旺副研究员在“现代儒商的文化情结”一文中论述到:企业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营文化,是企业在经营管理实践中形成的企业精神、价值观念、文化氛围及员工普遍认同与共同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这是企业物质、精神文明财富的

总和，是代表一系列相互依存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总和，是企业精神力量的体现，是以人为本、做人做事相统一的理念，它折射了从自然人到社会人、文化人，由产品经营到资本经营、文化经营，从胆商到情商、智商，从随意管理、家族管理到制度管理、文化管理；从人治到法治、自治的历史性、时代性转变。“以人为本”，既突出了人在企业中的作用，又体现了企业与社会的水乳交融关系，反映了企业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应有什么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公认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因此，儒商都把企业精神作为企业之魂加以大力培育和弘扬，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的儒商提出：“没有文化经不了商，没有文化兴不了商”。并在经营中，以文定位、以文布局、以文服务、以文促销、以文管理。在这些以文兴商的各要素中，以文定位是主旋律，以文布局是乐章，以文服务如音符，以文促销如演奏，以文管理如指挥。聪明的儒商深知，只有把五个方面协调起来，才能演奏出品位高雅、气势磅礴的企业之歌。

上海综合开发研究院的汪义生研究员在“儒家思想文化缔造了‘新华商’”一文中指出：企业文化就是通过企业中最活跃的因素——员工以发挥作用，其核心功能在于它作为员工行为潜在指南而存在，它熏陶、铸塑人的自我意识。不同的企业文化可以塑造出不同品位的员工，不同品位的员工，则可以创造出有着质的差异的生产力的诸要素。企业文化是企业的巨大资产，是发展生产力的潜在能源。新华商们认识到：必须设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调动员工的主体精神就必须关爱他们，关爱员工甚于直接关心生产。“新华商”很重视“感情投资”，创造各种条件尽量满足员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需求，努力搞好员工福利。员工由此产生一种“报效企业”的感情，甚至油然而生一种参与创业的责任心，激发

出生产上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企业文化能够形成不同的生产力,原因就在于:企业文化作为生产力,其真谛在于对人的创造性的解放与弘扬;企业文化包涵着社会的价值判断;企业文化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出现,从而使领导层的决策过程简化。提高员工的素质和士气,就等于创造价值,替企业积累资本,就实现了生产力的转化。“新华商”企业的企业文化的特点,在于具有“人本主义”的观念,以顾客为上帝,以服务为宗旨,以见利思义为美德,人人加强自身修养,以造福人类为终极目的,在商不唯商,求利不唯利。“新华商”在经营实践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理念,正是这种文化理念,推动他们的企业从家庭作坊式的小生产逐步成为集团化、股份化、国际化的现代企业。

五、21 世纪是儒商世纪

国际儒商学会会长潘亚瞰教授在这次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就明确提出:“1997 年 4 月在马来西亚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儒商大会的闭幕式上发表的《吉隆坡宣言》就予告了‘21 世纪是儒商世纪’,造就新一代的儒商的历史使命已落在我们的肩上。跨入新世纪,首次在贵阳举办儒商论坛,意义重大而影响深远。这次盛会是在雄伟的开发大西部的交响乐中进行,标志着新一代儒商茁壮成长,我国已迈上经文一体化的高速道。祖国日益富强繁荣令人欢欣鼓舞,和平统一在望更使我们信心百倍,儒商世纪带给我们的是和谐有序优雅文明的社会,幸福美满多姿多彩的生活。为此,我们热烈欢呼儒商世纪的到来,热烈祝贺这次大会的召开。”紧接着潘会长对 21 世纪是儒商世纪的原由作了如下阐述,他指出:一是中国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已涌现一大批儒商,儒商现象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是时代的呼唤,社会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二是中国已加入世贸,各行各业都必须与世界接

轨，照章办事，因此必须有个完善的法制社会与之相适应。然而目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仍很严重，必须德治与之配合。只有法治、德治双管齐下，严打伪劣产品、走私等一切违法犯罪才能奏效。儒商是经建的中坚力量，只有依靠儒商才能最终战胜一切奸商、劣商和不法官商。三是中国人口最多，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国运最昌盛，前途最灿烂，在本世纪内必将走向全商社会，中国将成为世上独一无二的儒商大国。四是儒商是精英一族，是“三个代表”的表率，最有文化素养，最会经营管理，最会运用先进技术，善于抓住一切商机，赚取合法利润，在商不唯商，求利不唯利，取之社会用之社会，造福人类。五是儒商也是德商，正因儒商重德，富有礼让精神，所以成为时代之骄子。六是儒商是商战的高手、能手。我国加入世贸后，面对世界各国商贸强手，竞争空前激烈，形势十分严峻，能否在这场商场中取得双赢，我们需要千百万儒商来迎接这一历史性世界性多元化信息化的全球挑战。因此，当前的急务是全力以赴培养新一代儒商。

贵州省中华文化研究会执行副会长、贵州日报社社长高宗文在会上指出：儒商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进行道德重构，恢复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应该看到：企业家精神的缺失已成为目前我国最突出最难以克服的一种对经济发展造成障碍的重大制约因素。在企业家精神缺失的背后，迫切需要的是制度环境的支撑和市场经济理念的提升。当此中国社会转型期，培养更多对社会具有使命感、责任心，并且能与时俱进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或者说现代儒商，是社会的急切呼唤。

2001年12月5日整理

“知行合一”与道德建设

陈 昌 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实践中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必须坚持继承优良传统和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王阳明是封建社会晚期的思想家，也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知行合一”学说，在论述知行关系中，更主要的是讲道德意识与道德践履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其有益的成分，有助于当前社会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

王阳明是在谪居龙场的艰难环境中始论“知行合一”的。当时，王阳明贬谪贵州，从繁华的京都来荒僻的龙场，身心备受摧残，加之龙场极度恶劣的物质条件，其生存环境可想而知。然而就是在这样极度恶劣的境遇中，王阳明仍专心致志，冷静思索，重新审视儒家之学，开始了“龙场悟道”，成就其“知行合一”之说。“知行合一”的提出，很大程度是针对明代世风日下，思想虚伪颓靡，强调道德修养和自觉性而提出的。出发点是为了挽救明代社会的封建伦理纲常，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贪污横行，百姓的悲惨生活。可见他的道德修养观是从社会、国家、人民的角度来着眼的，这对我们有很深刻的启示。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社会上出现“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的错误倾向，一些人为了自己的享乐，不惜损害国家、集体的财富，甚至为了一己小利，

把人民的利益置之度外。因此，在道德建设要以为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这与王阳明的道德修养观的着眼点有一脉相通之处，我们当继承古人不惧艰难，心系国家、社会、人民的精神，不断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树立了以国家、社会、人民利益为重的道德观念，如何实行道德践履？这是道德建设至关重要的问题。王阳明处在一个满口儒家经典，实则男盗女娼的社会风气下，如他所说：“盖今风俗之患，在于务流通而薄忠信，贵进取而贱廉洁，重儇狡而轻朴直，议文法而略道义，论形迹而遗心术，尚和同而鄙狷介。若是者，其侵淫习染，既非一人，则天下之人，固已相忘于其间而不觉，骤而语之，若不足以为患，而天下之患，终必自此而起。”^①正是为纠正这种只图表面谄媚逢迎，不顾内心道德操守败坏的状况，王阳明指出：“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作，以为必先知而后能行……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症的药。”^②这副对症的药是什么呢？就是将知行统一起来，强调在事上磨炼。“路歧之险夷必待亲身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先知路歧之险夷者耶？”^③“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④王阳明举这两个例子说明亲履历、重实践的重要性，也即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注解。今天的道德建设中我们也应当这样做。我们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它的着力点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也就是说要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的实践中，维护公共利益，公共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做到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在职业活动中做到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社会、奉献社会。在家庭生活中做到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

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只有在实际生活中亲身履历这些道德准则，才真正体现我们时代的道德水平。

道德作人的一种行为准则，它的特点之一是没有强制性。这就要求人们在履行这一行为准则时要有较高的自觉性。对此，王阳明也曾予以阐明。他对“知行合一”思想深化，提出了“良知”说，明确地把人的主体精神的自律当作道德修养核心。他认为“良知”是人人都具有的，只有“致良知”，每个人都能成为高尚的人，社会也才是一个平等、安定、有序的“满街都是圣人”的社会。王阳明的理想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强调人们在道德修养中的主体精神的自律，加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在当时社会具有极重要意义，对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也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道德建设态势良好，这是发展的主流。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对这些问题如何处置呢？如果涉及法律的，必须诉诸法律，绳之以法。但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涉及人们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问题。这就需要在加大道德思想教育的同时，不断增强人们的道德自觉性。因此，要广泛进行道德教育，普及道德知识和道德规范，帮助人们加强道德修养，把道德建设融于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之中，逐步完善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自律与他律相互补充和促进的运行机制，才能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是前人的知行关系的一种大胆挑战。中国古代对知行关系论述较多，南宋的朱熹继承前人知行观的各种理论，形成了一个比较细密和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在宋、明两代影响很大，朱熹也成为了儒家正宗传人。王阳明一生